

张永禄 主编

中国文学研究 2013 蓝皮书

文学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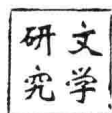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创意写作发展报告

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张永禄 主编

中国文学研究 蓝皮书

／ (2013)

主笔 李有亮 孙超 张永禄 谢彩 杨秀明 周显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分六个部分对 2013 年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做了综述,分别为文学理论研究、近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创意产业协作、文化及文化产业研究。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综合性较强,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员具有工具书的价值,也可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研究蓝皮书. 2013 / 张永禄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13-12308-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白皮书—2013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4690 号

中国文学研究蓝皮书(2013)

主 编: 张永禄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2308-4/I

定 价: 52.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1.75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52661481

序

文学蓝皮书是这几年学术界兴起的新事物,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白烨主持的《文学蓝皮书》(前身叫《中国文情报告》,后来纳入社科院的蓝皮书计划)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圣来主编的《上海文学发展报告》。前者主要关注当代文学发展,设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歌、戏剧、网络文学、文学批评与文坛热点论争、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共10个专题,分门别类地对年度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论争与文学事件等,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概要性的描述。后者则关注当代上海文学发展,系统梳理当年上海在文学创作方面新的收获,围绕文学批评建设进行的诸多讨论,以及在作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工作方面的举措与成效,对一年来上海文学若干焦点问题与现象进行专题分析,整体上分为:总报告、年度关注和作家作品三部分,并附录了年度的上海文学纪事、上海文学发展相关统计数据及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近年来资助的文学创作项目,以求客观、翔实地保留有关上海文学发展的多方面资料。

本书作为蓝皮书,与以上最大的不同有两点:

第一,从内容范围看,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蓝皮书,我们设想的范围应该包括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创意写作等七个部分,重点是对年度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梳理和概览。因为某种原因,这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综述阙如。根据本专业建设和发展目标,我们增加了文化研究和创意写作这两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情况,一定程度弥补了如上缺憾。可能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和创意写作和中文专业不大沾边,这样做有硬塞之嫌,这就涉及组织编写单位的具体时间情况了。汉语言文学(文化创意产业方向)专业在上海政法学院是“年轻的老专业”,但是中文在上海政法学院是新专业,才6年历史。根据学校“创建有特色、高水平、培养应用性文科人才的文科大学”的建设目标,结合专业现状,我们在传统中文专业的基础上,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市场对文化创意人才需求,培养“一文双能”(“一文”是具备较为全面的人文素养,“双能”是优秀的创意写作能力和务实的文化产业管理能力)的中文应用人才。故而,文化研究和创意写作研究成了该书的应有之义,也是特色构成。

第二,编写这本蓝皮书,是从高校和专业的教学需要为着眼点,而不是仅仅为研究之需。与其说它是研究参考书,还不如说是教学工具书。众所周知,作为一名站在高校讲台的专业教师,有责任和义务了解本专业内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时更新自己的教

学内容,以一定形式渗透在教学之中。在学科发展越来越细化,而本科教学愈来愈追求通识教育的今天,希望通过这种努力,能一定程度克服教师的个人教学和科研两张皮的现象。

基于如上两点理由,就有了该书的存在。在为每一门学科做年度研究综述的时候,我们的写作目标力求聚焦本学科年度重要的理论成果、文学活动和事件等,注重文学研究内在的延续性,凸显深发性或可持续性学术话题,而不是追求面面俱到或大而空。事实上在3~4万字的篇幅内也不可能做到大而全。因而,与一般的蓝皮书相比,本书的宏观性和综合性较强,微观性和专题性相对不足。

万事开头难。毋庸讳言,该书一定会存在一些瑕疵,乃至问题。但是,我们定会坚持把《中国文学研究蓝皮书》办下去,在今后的编写过程中逐步发现、改正问题,力争把它办得越来越好。

目 录

一、文学理论的自觉：反思与建构	
——2013 年文学理论研究综述	(001)
(一) 反思：理论自觉中的多样性发现	(001)
(二) “理论之后”：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描绘	(006)
(三) 反本质主义论争与“中国问题”	(009)
(四) 文化理论场域：勾勒与期待	(014)
(五) 新媒体文艺现象及学科化建设	(020)
二、解蔽与细化	
——2013 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综述	(025)
(一) 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新探讨	(025)
(二) 文学思潮、社团与流派研究新突破	(026)
(三) 各体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028)
(四) 作家作品研究新拓展	(040)
(五) 报刊与文学研究之新收获	(043)
(六) 翻译文学研究之细化	(045)
(七) 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之新进境	(049)
(八) 近代文学教育研究	(052)
(九) 学术史梳理与学人研究	(053)
三、多元视角与微观聚焦	
——2013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055)
(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料方面的新进展	(055)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生活化与微观化	(058)

- (三) 新的文学史观在崛起: 民国视角与民国生活 (066)
- (四) 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对话: 从鲁迅到莫言 (075)
- (五)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 (077)

四、热点聚焦·历史化与经典化·趋向

——2013 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综述 (081)

- (一) 研究热点聚焦 (081)
- (二) 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努力 (088)
- (三) 趋向 (096)

五、创意写作学: 在希望的田野上

——2013 年中国创意写作发展报告 (108)

- (一) 创意写作教学兴起与中文专业改革突破 (108)
- (二) 欧美创意写作理论和训练的系统引进 (116)
- (三) 本土创意写作理论的探索与初步建构 (123)

六、从“批判性”转向“建设性”

——2013 年文化研究及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135)

- 上篇: 文化研究文献述评 (139)
- 下篇: 文化产业研究文献述评 (163)

一、文学理论的自觉：反思与建构

——2013 年文学理论研究综述

2013 年的文艺理论研究,单从其留给人们的现象表征来看,依然保持了上年的基本发展态势,即新增的研究热点并不太多,学界关注的问题相对集中于文艺学的若干重要领域,诸如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反思和未来勾描、本质主义论争与“中国问题”辨析、文化研究的理论场域拓展以及新媒体文艺现象与学科化建设等。在对上述领域的关注中,研究者继续表现出近年文艺理论界坦诚而直接的对话风格,并较以往明显增强了理论话语的自律意识和学科自觉,少了几分浮躁,多了一些涵容,且在彼此不同的多样化学术路径中,普遍贯注着对既往研究的理性反思和着眼于当下的理论建构意向。这使得本年度看似并不热闹的文艺理论界整体透露出一种严谨、踏实的专业气质和建设风范,在“理论原创”、“资源整合”、“文化自性”、“中国问题”、“中国诗学”、“新媒介文艺现象及学科化”等文艺理论的重大问题或关键节点上,均体现出进一步拓宽与深化的积极努力。

(一) 反思：理论自觉中的多样性发见

陶东风曾经讲过一句话:“‘反思’成为这几年文艺学论文和会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①这句话仍然适用于 2013 年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其实,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一直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总是在不言自明的命题先验式与主观感觉的个人经验式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摇摆不定,前者往往忽视与当下现实语境的密切关联,后者又满足于个性化言说而忽视文学理论的学科完整性。因此,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剧,中国文学理论日趋开放,文艺学界开始对 80 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理论研究进行反思。无论是童庆炳、钱中文、杜书瀛为代表的学术前辈,还是董学文、李春青等为代表的中年学者,以及王一川、陶东风、南帆等为代表的青年才俊,可以说,这种反思性研究已经在老中青三代文学理论学人那里均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加上活跃在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学院等科研聚集地的一大批中青

^① 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文艺争鸣,2010 年第 1 期。

年文学理论研究者,大量新的理论视角的不断开辟,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借鉴应用,共同构成了文学理论反思研究的可喜局面。

1. 问题说

站在不断变化的当下语境中来检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在宏观视域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2013年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进程研究”负责人,赵慧平对中国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做出的总体判断是,“仍然处于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引进、吸收与融合阶段,在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学术传统诸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和特点,因而文艺思想的创造和理论阐述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原创能力。”^①其原因主要归结为:一是“没有形成研究基本理论的学术理念”,不能够提出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二是“文艺理论研究队伍的格局”因学科分类过细而显得不够合理,弱化了基础理论研究。无独有偶,青年学者金永兵在评介董学文的“文学理论学”时也再次提出“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这样的“根本性、前提性”问题。“有人认为它是科学,其目的在于探求文学的一般规律;有人认为它就是文学批评;有人则认为它与文学创作是一回事,是对创作主体诗意存在的言说,等等”,并指出“这样的混沌模糊状况,存在于关于文学理论本体问题的各个方面。”^②当然这样的发问方式在一些年轻的反本质论者看来无疑还是表现出浓郁的“本质”眷恋,但是这种相对接近传统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方式,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简略地勾勒出中国文艺学研究的整体样貌。

同样是谈“问题”,在文艺理论界颇具创新活力的顾祖钊先生则把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境遇紧密结合起来,指出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论一直在“全盘西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这两种模式中生活,并借用年轻学者王宁的“理论失语症”之说,指出这种“失语”背后透视出的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和理论创造力的萎缩。他坚决反对那些企图抛弃“一切文化之根和一切的连续性”(拉曼·塞尔登语)的后现代反本质主义者,认为今天中国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是告别昨日“西化”之路,建立新的“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走出“自己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的创新之路。”^③

2. 转型说

对于当下文学理论面临的种种困惑和疑难的反思,有一些研究者并不将之主要作为“问题”来归认,而是倾向于把它置于一个历史性的动态架构中予以阐释和描述。从哲学到历史,从理论到批评,从命题到阐释,从审美到文化,这同样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贯穿中国整个学术领域的一种基本趋势。面向大众市场的全面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置身的社会文化语境,也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知识社会学语境,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无论

① 赵慧平. 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几个主要问题.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② 金永兵. 理论自觉时代的反思与重构——兼评董学文的“文学理论学”建构.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3年第4期。

③ 顾祖钊. 中国文论家:该换一种“活法”了. 文艺争鸣, 2013年第1期。

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资源,还是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开始发生变化继而走向转型。有学者将这种“转型”冠以“大文学理论”之名,并从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身份认同、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做了系统解读。从研究对象看,文学理论研究“已跨出了单一的文学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包括“文学活动”、“文化活动和“理论自身”三个方面,并分别以“理论的批评化”、“文学的大众化”以及“文学理论的自觉化”为例阐述了时代转型带来的文学理论变化,其中作者还特别提示文学理论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容易出现“窄化”或“泛化”的弊端。在谈及文学理论研究者“身份认同变化”问题时,文章描述了文学理论研究者从“广场”回到“书斋”,“并在学科之内或自觉、或无奈地被体制化”的身份变化,并深刻分析出这一身份变化背后隐藏的“矛盾”本质:从维护知识分子独立性价值立场来看,“这种立足于学术体制内的生存方式,使得文学理论研究者一方面已然没有了独立于体制的真实力量乃至内在诉求,另一方面,其学术生产不受市场的影响,而更多地只需对体制负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体制化的市场和市场化体制负责。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对世俗社会和商业市场不屑一顾,试图由此来获得一种精英式的批判性视域,以代偿性地满足那曾经有过的知识分子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批判性”;但他们看清了商业文化与官方体制之间的“同谋性质”之后,又必然导致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这种精英认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而在论及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转型时,论者深刻揭示了文学理论对政治文化价值的暧昧态度,即在“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之间的无奈摇摆,并特别强调了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发生的是向“大文学理论”的转型而非断裂这一判断,进而指出这一认识对中国文学理论学术史评估、对今天文学理论建设之路的选择以及当下文学理论学术效用的发挥,均具有重要意义^①。

对于文学理论的历时性观照,有的研究者将视野投射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与现代性相联系,使用了“涅槃”一词来表达文学理论所获得的“重生感”。“从文学理论方面概括地说,就是三十余年来发生的由政治一体化到跨越式阐释与大众个性化思考的现代性转型。”^②其中“跨越式”这一表述显然掺杂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记忆印迹,由此使本文对于“转型”的描述更接近于“转折”、“再生”等强烈语义。而另一篇文章也论及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却是选取了“文论教材中文学性质的演变”这一视点,研究时域也扩大到建国以来60多年的历史阶段,刻画了中国文学理论在高校教材中从“上层建筑”到“审美意识形态”再到今天多种文学理论资源整合、对话的“定义史”^③。而“定义”的背后恰隐含着独特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及由此促生的特殊文学理论生态,于今仍有警醒意义。

2013年有关文学理论转型的表述,运用“范式转换”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转型观,恐怕与上述观点相较更体现出一种理论思维范式的显著不同。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随

① 肖明华,周云颖,“大文学理论”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发展走向考察,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② 高楠,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涅槃——由政治一体化到跨越式阐释,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③ 刘锋杰,尹传兰,从“上层建筑”到“审美意识形态”——60年来文论教材中文学性质的再定义研究,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

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各种理论交会与融合过程也在不断加速,而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各种理论内部的自我更新,而且导致全球范围内文学理论格局的巨大变化,由此从外部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压力抑或推动力。如何考察中国文论面临的范式转换趋势,就构成了一些研究者的理论切入点。王一川通过回顾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留下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提取出了其中若干中国文论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学术思想范型,同时也指出这些成果的获得过程中也留下了闭关排外、以抑制学、重思轻在等一系列历史教训。所以,他主张在借鉴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以中化西”的思想路线,弘扬“以今活古”的思想原则,促进文论范式的健康转换^①。这种以史为鉴的诉求,在戴登云那里被置换成了“返本穷源”的说法。戴登云指出,由于“受某种同质化、单向度的思想视野的制约,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追新求变’的路径依赖”。他认为,“趋新”并非意味着“转型”,相反倒可能意味着某种路径依赖和思想制约,“真正的转型往往意味着向本源的某种回归——回归到文论研究和文学书写原初发生时的问题意识,回归到文论研究和文学书写的全部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他提出的“返本穷源”,就是进入到某种“更本源的原初境域”^②。

3. 阐释说

在对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中,有一种思路值得关注,即试图越过文学现象的层面努力进入到文学理论的学术史与学科背景中看问题,这就是中南大学毛宣国教授提出的“回到对学科本身的反思中去认识文学理论自身特点”^③的研究方法。且不论这种方法是否就能完全避开文学理论学术史于学科背景描述过程中的历史语境作用及不同时代研究者的主观特性,从而获得清晰可靠的知识线索,单就其站立的研究视点高度,还是能够显示出一定的整体性和覆盖性优势,可以绕开一些诸如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究竟是“传统经典文学艺术”还是“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现象”之类的争论,把注意力投入到文学理论学术发展历史的观察与探讨中去。正是缘着这一路径,毛教授有了一个富有启示的发现:“无论是从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理论学术发展史来看,文学理论原本就是一门具有阐释意义的学科,它的主要存在价值是对文学活动与文学现象的解释与评价,而不是为文学立法。”这里作者还特意将文中所用“阐释”一词界定为是建立在人文学科普遍原则与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与“立法”一词相对应,从而与后现代理论中所主张的处于表征危机、否定一切普遍性价值原则的“阐释”作了区别。在接下来对中西方文学理论中所存在的“阐释”与“立法”两种形态的梳理过程中,揭示了古代文学理论发展以“立法”为主,而进入20世纪以后由“立法”走向“阐释”、由“独断”、“自明”式的话语走向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反思、交互对话、彼此渗融的历史进程。在论及当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争论时,作者提出两者必须统一的观点,即既要看到从文化角度进入文学现象的研究利于提供“一种新的理论阐释”开放性视野,又必须强调“回归文学本体,

① 王一川.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反思与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② 戴登云.论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③ 毛宣国.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回归文学经验与现象”，否则，文学研究就可能失去自身的立足点，沦落为被彻底边缘化的学科。

这种观点也传递出学界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担忧。在2013年5月于天水师范学院召开的“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前沿论坛暨《当代文坛》2013学术年会”上，就有多位学者提出文学研究如何“从文学本体出发”的主张。东北师范大学张文东教授强调“文学批评从文学阅读开始，从诗性开始，从心理体验开始”；天水师范学院郭昭第教授指出，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因此中国文论体系的重建，不应只是理论的推演，不应脱离文学实践，而是应该从文学实践出发，从文学本体出发，在汲取中西方文论资源的前提下，重构出一种对当代文学真正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体系^①。由此看来，“阐释”这一重要文学理论范畴，一边挟带着20世纪末期西方由文化研究向文学研究、由“文化理论”向“后理论”转变之后重本文阅读、重文学体验的后现代思想气息，一边又与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审美直觉和感性阐发的文学传统形成对话，有意无意中在中西方文学理论之间搭建起一座互通往来的“桥梁”，也使得重建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构想似乎增加了一个值得期待的楔入点。

4. 理论安全说

在对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困境的反思中，“理论安全”问题的提出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就文学理论领域来讲，“安全”一词可分两层理解：一是与危机相对，就是说文学理论应当对理论自身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加以充分重视和总体警觉，“安全”即可读解为理论的自知、自救和自我完善；二是与危险相对，就是说理论本身既可能是安全的，也可能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相对保证理论在运用过程中能够通过克服自身的危险而达至一种安全境地^②。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提出“理论安全”警示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理论发展往往会在各种显性和隐性力量的推动下形成自己的运动惯性，它积蓄在学科自身内部，反过来对理论的主体自觉意识形成遮蔽。正如段吉方所指出的，“文学理论在学科内部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困境，这种种危机征兆和危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其发展惯性中带来的深层次学理问题”^③。针对此，有的研究者试图从知识考古角度考察“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企图剥离其中的“科学式”文学理论，强调应从“文学”的“科学系统”转向“理论”的人文学描述^④。而面对学界目前存在的文学理论终结论的悲观态度，有人回应认为文学理论理应有多种形态，所谓理论终结只会是某种理论威权话语的式微，而理论自身是不会终结的，它立足于现实实践不断反思自身，从而获得了自身的发展并涌现出新的形态^⑤。所以，理论更新和理论边缘化态势为其中

① 马超，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如何从文学本体出发——“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前沿论坛暨《当代文坛》2013学术年会”述评，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② 赵静蓉，理论安全性，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3年11月编，第394页。

③ 段吉方，当代文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面临危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1日。

④ 贺昌盛，“文学”的“理论”建构：何以可能？——“科学式”文学研究的终结，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二届青年论坛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3年11月编，第57页。

⑤ 张良丛，终结还是自反：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应有之意。从“理论终结”到“理论之后”，体现出的正是文学理论自我拯救。但与此同时，也给我们提示了理论本身进入惯性运动状态后确实隐藏着的危险，而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明智选择，就是理论的不断反思与自觉^①。

5. 形式研究说

与上述研究面向较为宏观的文学理论反思不同，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春青教授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及关联因素研究”的阶段成果中，集中笔力对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对形式主义文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反思与评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以俄国形式主义为龙头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成为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时至今日在学术实践中依然能够看到这种影响力的延续。李教授在文章中首先分析了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备受关注的时代语境特点，他抓住“科学主义”这个隐含在形式主义文论内部的思想基石，分析了其对形式主义的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追问真相的冲动，二是语言学方法的介入，三是学科独立性的追求。而这些方面正构成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焕发勃勃生机的重要推动力。从当时学人们对“文学性”的叩问激情中，透露出的更多还是“拒绝充当政治的工具，还我精神的独立与自由”的“去政治化”意识形态批判与人文精神诉求。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文论研究，则“已然回归学术，成为一种纯粹学理性探讨”^②。基于这样的变化，文章重点对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形式主义文论一些核心概念、范畴、问题所作的探讨进行了较细致的评述和辨析，特别是对叙事学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进行了重点刻画，并对这一转折中体现出的“克服了以往的些许偏激和局限，寻求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叙事理论和批评实践的融合”这一积极趋势予以充分肯定。

文章还梳理了形式主义文论发展的学术史脉络，对学界存在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两次转向”、“三个阶段说”，另一种是“惟文本”研究及其“封闭性”）分别进行了价值认定及局限评析。并在这部分特别评述了探讨形式主义文论与其他理论资源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见出作者对不同理论资源交互影响渗透的重视，以及对不同理论范式产生、变迁过程中构成成分的“非单纯性”特质的清醒认知与把握。最后，文章对中国学界形式主义文论研究中，中西比较研究取得的成果予以总结，在比较诗学的关联性视域中反观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传统，意在拓宽旧的视野，启迪新的方法与视角，促进本土文论的进一步发展。窃以为，这种有限视角下的“专题式”反思及纵深细描、横向评析的行文架构，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二）“理论之后”：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描绘

关于文学理论未来的讨论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在西方文学理论界是如此，自从

^① 陈雪虎. 理论的位置：名实、脉络与定位. 文艺理论研究, 2013年第3期。

^② 李春青, 袁晶. “形式”的意义——近年来中国学界形式主义文论研究之反思. 中国文学研究, 2013年第2期。

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本世纪初著名的《理论之后》中发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为了过去”的哀叹之后，“理论已死”成为后现代人文思想中一个鲜明的印记。然而，仍然有诸多的西方理论家对此不予认同。卡勒说“理论并没有死亡”，让-米歇尔·拉巴特也说“理论从来就没有停止回归”。但是，在“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学理论家眼中业已形成的普遍认识是，尽管理论未死，但它的“黄金时代”确已过去。在中国文学理论界，近年关于文学理论未来的探讨也从未停止，尽管受到西方“理论之后”思潮的强烈影响，也有一些悲观言论出现，但在整体上却呈现出明显的乐观态度，并且伴随着理论“反思”而不断生发出建构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充沛热情与实践动力。2013年，这样的势头仍在上扬阶段。

1. “黄金时代”：是否成为过去

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文学理论还有没有值得期待的未来？中国学界的声音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国内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王宁素有跨文化研究视野和国际人文学养，其对文学理论的未来评估是与“后人文主义”世界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全球化”意识自觉使他基本认同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看法，“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缺乏大一统理论话语的时代，但是各种理论思潮却可以在自己的有限空间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其对文学理论的未来表示悲观，相反，“文学理论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文学理论仍有着广阔的情景。它虽然无法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却永远不会消亡”^①。

同样是对文学理论未来的展望，老一代学者首先显示出意志上的坚定及价值面向上的选择性，“我们不能向后看，而应向前看；我们不能面向过去、面向书本、面向权威、面向经典，而应该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在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实践中，寻找应对现实的对策，提出适用于今天现实的理论、思想；我们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应该在充分学习、吸收中外优秀的文艺传统、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把关注的重点和中心放在今天的现实（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上，总结新鲜的文学艺术经验，提出新鲜的文艺思想，建立和发展现代的文艺学。”^②若是剥离开这番表述所晕染的传统话语色彩，还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内在的时代气息与学术热度，尤其是对“现实”、“今天”、“新鲜”等语词的着力，让人很难忽视其中蕴涵的于当下学术活动中已然稀释的人文关怀。这一表征，在顾祖钊的文中也清晰可见，他确信“文学理论的未来形式，也必然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着时代价值诉求的形式”，并且“不能拒绝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他甚至断言，“现代文论若不接通民族的文学理论的血脉，它就没有未来”^③。时代自觉的精神根基，确应是本土文化传统的澄明与自性。未来无法与过去割裂开来，否则将成为“无根的未来”。从这点说来，上述杜先生的“不能向后看”、“不能面向过去”之说倒亦有欠周全之嫌。

① 王宁，后人文主义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艺争鸣，2013年第9期。

② 杜书瀛，理论的脚步——新时期文艺学乱弹，文艺争鸣，2013年第5期。

③ 顾祖钊，文学理论的未来与中国文化诗学，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4期。

2. “文学理论学”与“中国文化诗学”

未来既是预见的,也是建构的。从近年文学理论的系统性建构成果来看,“文学理论学”与“中国文化诗学”堪称是两个代表。2013年,这两个体系构想进一步得到阐发和推举。

“文学理论学”的提出者董学文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的重要代表,他在2001年出版的《文学原理》一书中即立足于“元文学学”哲学层面对文学的基本理论展开思考。“元文学学”的学科定位与本质内涵被确立为“以文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以辩证法和人文精神为学科思想基础,以科学的求是态度和可操作的方法为其学科构架依据,对文学理论的本质、形态、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变化规律等进行全面考察,进而对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进行规范、整合的科学。”^①书中选取了“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样”、“文学有什么用”、“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六个“元问题”进行论述,形成颇具特色的文学理论学科架构。2004年董先生出版了《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正式提出了“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并分别从“什么是文学理论”、“对象与要素”、“理论家与理论共同体”、“生成与转化”、“形态及其存在方式”、“范式演变”、“系统与特性”、“结构与话语特征”、“阐释与评判”等方面构建学科基本的问题系统。由此看,“文学理论学”试图将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互结合、互为呼应,在这一互动关系中揭示理论实质。

“中国文化诗学”构想是由顾祖钊先生提出并阐述的。作为对中国文学理论未来的积极回应,顾祖钊坚信两点:一是“文学理论的未来形式,也必然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着时代价值诉求的形式”;二是“未来的文学理论是不能拒绝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在时代性与本土性相兼容的整体思路下,他提出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六大“合理的文学理论主张”进行梳理整合,包括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内涵中国现代性民族意识的觉醒)、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西文艺理论融合论(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宗白华,到新儒学,再到钱中文、童庆炳等)、新理性主义讨论、文化人类学转向以及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主张,尝试将此六种文学思潮中的“正能量”聚成合力,以此为基构建“中国文化诗学”体系。顾祖钊于此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两大长处”:一是“有真切体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二是有“丰富的华夏文化文论资源”,主张在“新理性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以新的“民族主体意识”为灵魂,在开放的全球化语境中构建起具有崭新的“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体系^②。

3. 中国文论资源:反思与重识

关于文学理论的资源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文论未来指向的一个核心问题。近年有关文学理论“接地性”的热烈讨论,正是这一问题的持续反响。2012年即有不少学者撰文予以探讨,如高建平《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王元骧《也谈文学理论的“接地性”》、王先霭《如何实现文学理论本土化》、赵宪章、曾军《现实关怀及其问题——对话中国文学理论未来之走

① 金永兵.理论自觉时代的反思与重构——兼评董学文的“文学理论学”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4期。

② 顾祖钊.文学理论的未来与中国文化诗学.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4期。

向》等,针对中国文论资源建设及如何寻求理论突破提出了“问题意识”、“人文关怀”、“中西交融”、“现实追问”等发见性观点^①。而在2013年,这一问题依然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除了上述顾祖钊提出的整合六大理论资源的主张之外,金永兵指出“中国文论长期缺乏主体性,没有自己的理论问题”,强调文学理论研究要“从问题出发”,“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本问题研究,多一些理论共同体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争鸣和探讨”,而且发现问题必须首先“恢复理论与现实生活的有机关系”,认为“只有从具体的历史联系与变动中人们才能获得科学的文艺观点”^②。徐希平主张“以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为核体,而融合西方文论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论、民间文论资源”,充分注意到了中国文论资源的民间性和多样性生成价值。郭昭第坚持“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的观点,反对纯理论意义的凌空蹈虚,指出“中国文论体系的重建,不应只是理论的推演,不应脱离文学实践,而是应该从文学实践出发,从文学本体出发,在汲取中西方文论资源的前提下,重构出一种对当代文学真正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体系”^③。毛宣国也十分重视本土资源的充分占有和合理利用,强调“必须重视本土的文学实践与文学经验”^④。王伟博士则从“地球村”时代特征着眼,认为当下思想与理论市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面对这种国际化的理论交互关系语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如何整合既有的理论资源,而不是执迷于原创、进而盲目排外”^⑤。

(三) 反本质主义论争与“中国问题”

2013年的中国文学理论界,若要说在相对寂静中却也存在着一些局部的热烈景象,那依然应该还是反本质主义的论争了。这是近年来文艺美学界一个持续的热点。这场论争的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有所深化。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升温的缘由已为人熟知,即是以陶东风在2004年主编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中对文艺理论教材中的本质主义趋向的批判肇始。而其实在这本教材面世之前,陶东风就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批判。之后几年围绕本质主义话题的争论一直不断。2009年,《文艺争鸣》杂志开辟“关于文艺学的建构论与本质论问题的讨论”专栏,连续刊载相关研究文章对反本质主义论争进行反思与总结,从2009年第1期到2010年第1期连刊25篇文章围绕论题进行讨论。期间各路论辩好手或两两捉对,或三角鏖战,或组队排阵,一时确有烽火连天之势:如陶东风与吴炫、陶东风与支宇、曹谦与陶东风、王晓华与陶东风、王伟与王晓华、王伟与吴炫、李自雄与王伟……铁笔交纵,马蹄缭乱。应当说经过几番论战,使这场论争的背景、实质、思路、策略等一些基本问题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辨析与澄明。然而

① 曾军,苗田.探索接地和及物的文学理论——2012年文艺学研究热点扫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② 金永兵.文学理论:从问题出发.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③ 马超.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如何从文学本体出发——“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前沿论坛暨《当代文坛》2013学术年会”述评.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④ 毛宣国.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⑤ 王伟.反本质主义、文论重建与中国问题.文艺争鸣,2013年第1期。

截至目前,“反本质主义”仍然是文学理论界的争执焦点和热门话题,涉及问题既有以往所论问题的延伸,也有新的聚焦话题出现。2013年,在继续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基本涵义澄清之同时,关于“经典”、“标准”、“意识形态”以及“理论原创”、“中国问题”等构成新一轮论争的关键词。

1.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再认识

对于什么是本质主义,人们较多依据的解释还是陶东风在21世纪初即作出的描述,即本质主义是“指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①。在反本质主义看来,世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本质。他们的理论外援主要是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始终在“成为”之中,因此欲确定其稳定特征的做法都是“反历史”的做法),还可指向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真正的哲学就是与语言的抗争,倡导语言分析哲学)等。而被称为本质主义的以老一辈为主体的文学理论家们,虽然彼此也存在诸多学术分歧,但相对于中青年为主体的反本质主义而言,还是普遍倾向于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皆有其本质,人们可以运用理智与知识,通过严谨的科学推理和哲学的洞察力,透过现象给揭示出来。人们可以反对绝对化的本质论,但不能否定科学主义的本质论。杨春时就曾指出:“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可能取消文学本质的问题,因为正像一切关于知识的问题以及哲学问题根源于人们对于世界意义的追问一样,文学本质的问题根源于人们对文学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本身是不能被解构的。”^②当然也有研究指出陶东风等主张的反本质主义究其实是一种新的本质思维策略^③。而吴炫的观点似乎更接近于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反本质主义,他把“本质主义”和“本质化”做了区别:前者是指“观念成为一种理论,理论具有普遍影响”,后者是指“权力对一种观念的中心化、现实化干预”^④。在这针锋相对的论战之间,吴炫的说法颇具缝合、协调的意味,却不期落于本质与反本质论争的交火中心。而作为学术立场上的“盟友”,王晓华在辨析陶、吴之争的诸多分歧中力挺吴炫关于本质的区分,认为批判“本质主义”与批判“权力主义”性质上是两回事,由此也对陶东风将“本质主义”与“威权政治”捆绑一起的说法表示了慎重的质疑^⑤。

至于反本质主义,同样面临着学界诸多的诘问,而其同盟内部也不断发出“不和谐”的声音。除了有人对其在策略意义上的本质思维特征予以剖视外,也有文章就反本质主义试图解构的对象进行了细分:“反本质主义能解构或已经解构的,是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学本质;没有解构,也解构不了的是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积极主张者,王伟博士对某些反本质主义论者“间歇性出没的本质主义思维”表达了不客气的批评,他将“反本质主义”的两种读解方式进行比照,一种是“反-本质主义”,另一种是“反本质-主

① 陶东风. 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文学评论, 2001年第5期。

② 杨春时. 后现代主义与文学本质言说之可能. 文艺理论研究, 2007年第1期。

③ 曹谦. 反本质主义的本质——评陶东风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 文艺争鸣, 2009年第5期。

④ 吴炫. 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 文艺争鸣, 2009年第3期。

⑤ 王晓华. 什么是文艺学论争的“中国问题”? 文艺争鸣, 2011年第9期。

⑥ 李自雄. 关于反本质主义的三个关系问题. 文艺争鸣, 2013年第5期。